

●蒋子龙专栏●

落花无痕

□蒋子龙

不知是历史上的诸多文学奖,培养了一批活跃于当代文坛的年轻作家,还是这些出色的年轻作家,支撑着这些文学奖。我在“冰心散文奖”的颁奖典礼上,结识了手捧获奖证书的王浩。近年来,她还获得过全国青年散文大赛的银奖、华人母爱主题散文一等奖、全国职工散文大赛和海洋文学大赛的二等奖以及丝路散文奖等。正应了一句笑谈:“拿奖拿到手软。”

中国散文学会的红孩先生,似乎是为成全我的好奇心,嘱我阅读王浩的散文集《落花无痕》,如有所感,便成文以为序。令人颇为惊异的是,这部书稿竟真的是“落花”缤纷,满地铺香。作者似有“少年子弟江湖老,红粉佳人两鬓斑”的历练与感悟,书中人生态度,自然万物,无所不包。

“任意而谈,无所顾忌”——这是鲁迅先生为散文定下的概念。写散文最容易的是这八个字,最难的也是这八个字。可以自由舒张、汪洋恣肆,但要辞

章谨严、意境深邃。如王国维所言“散文易学而难工”,看来,写好散文的确不容易。

王浩依傍现实,遐思纷飞,语风流利,娓娓而谈,读来清新而隽永。像《寻找,那消失的蓝天》,由城市里的蓝天,写到草原上明净的夜空,“琴声渗入草原的肌肤,花草也为一振,荒野变成梦园”。意境开阔,任由驰骋,支撑和润滑这文思驰骋的,是作者的情感。散文最重要的元素是“较真”,要真实、真切、真挚,关键时刻甚至要“赤裸裸地表达”。现代人容易事散、心散、情散、事散,而散文虽“散”,却提供真情,提供一点精神、一个思想、一种智慧,或一件事。而且,表达的精彩,或辞赡韵美,或天矫奇崛。因此,也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,最为灵活便捷地反映了现代人掩藏在散漫外表下的紧张、浮躁与不信任情绪。这也正是在“文学被边缘化”的抱怨声中,散文却有足够的定力,并能保持其

应有生命力的原因。

《听懂戏曲时,已是戏中人》,只这题目便道出了一个极普遍却又未被人道破的世间现象;人戏便是人世。“绯红色的脸颊,写满了青春烂漫。粉色罗裙摇曳起乡间的风,俗气中不乏某种生动。他们于嬉笑怒骂间演尽人生百态,片刻的光阴里已将众人的生活囊括其中。他们像行走于自然中的诗人,吟唱着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故事。众人痴痴地陶醉于其中,随他们哭,随他们笑,随他们在别人的经历中醉生梦死一场。”说得俏皮,舞台上戏曲,反倒能给人以某种厚重的现实感。此文的新意也在这里。文字过于华丽娇饰固然是行文大忌,但也绝不能太过平淡浅易,散文就该是美文。

王浩散文中写人物,似更擅胜场。《土墙下,那个微笑的失语者》,更像是人生大戏的一个场景,标出了环境、背景和人物。一个自小善良聪明的哑巴,乐意想所有想使他人做事,长大后

为了能讨上媳妇,更是向所有乡亲示好,挥霍自己的善良和体能。所有人都都在利用他的善良,却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把自己的姑娘嫁给他……

书稿中的一组人物散文,最见王浩的风格与才情。或一个生活片段,或简括地勾勒人物的一生。如穷到近于绝境的林嫂,作者倾诉的是一种深切的无奈;“枣树下的五奶奶”,则表达了一种透骨的苍凉……但作者一直娴熟地拿捏着散文的尺度,忽而贴近,忽而疏离,或文笔发强刚毅,或语气宽裕温厚。不琐瑣言教,又不使自己陷入词汇的泥沔之中,始终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清简秀媚的语态。

“语言属于女人”——此言确乎不虛。感觉应笔而生,文字顺笔流淌,完全自然,完全诚实,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丰富感与变化感。

深读王浩的散文,不免思绪活跃,感触很深。

兴文萍墨

酒馆的分类

□肖复兴

清震钧《天咫偶闻》一书说北京的酒馆有南酒店、京酒店、药酒店三种:“一种为南酒店,所售者女贞、花雕、绍兴、竹叶青之属;肴品则火腿、糟鱼、蟹、松花蛋、蜜糕之属。一种为京酒店,则山左人所设,所售则雪酒、冬酒、木瓜、干榨之属;而又分清酒,清者郑康城所谓一夕酒也;又有良乡酒,出良乡者,都中亦能造,于冬月有之,入春则酸,即煮为干榨矣。其肴品则煮成栗肉、干落花生、核桃、榛仁、蜜枣、山楂、鸭蛋、酥鱼、兔脯之属;夏则莲、藕、榛、栗、杏仁、核桃,佐以冰,谓之冰碗。另有一种药酒店,则为烧酒以花雕成,其名极繁,如玫瑰露、葡萄酒、五加皮、莲花生白之属。”

见过的酒馆,没有震钧所说的这样种类丰富,内容繁复。这样的酒馆,在北京并不属于大众。遍布大街小巷的,大多只是小酒馆,门面不大,几张桌子板凳,都没有油漆。大门总是敞开着,夏天一个竹门帘,冬天一个棉门帘。那情景,和北京人艺排的话剧《骆驼祥子》里那个拉洋车的潦倒老人,在风雪之夜撩开破棉布门帘进来很相似,和那些灯火辉煌的大酒店有霄壤之别,和震钧所说的三种酒馆也不搭架。

这样的小酒馆门口或门内,一般放一个大酒缸,酒缸上的木盖,就是放酒的桌子,人们就坐在酒缸前喝酒,一般都是地瓜烧。下酒菜,一般就是一盘花生豆,顶多再有一盘猪头肉,就很好了。不过,他说的成栗肉,我倒见过,那时候,我跟父亲去过这样的小酒馆,父亲喝酒,给我买一盘这样的栗子吃。栗子是带壳煮熟的,上面剪了一个十字口,很入味,和糖炒栗子完全不同。

在老北京,管这样的小酒馆叫作大酒缸。



小酒馆,大酒缸(漫画) 喻萍/作



蒋子龙

“语言属于女人”——此言确乎不虛。感觉应笔而生,文字顺笔流淌,完全自然,完全诚实,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丰富感与变化感。

孤帆远影

——怀念我的父亲贾大山

□贾永辉

有一段时间,我经常暗自回忆父亲在世时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。大概由于想念他的缘故,有时候我的情绪或思维有些混乱。总而言之,父亲短暂的54年人生,可以说是在“孤寂”中度过的,这似乎也恰是一个作家的本分。也许有朋友认为,父亲短暂的一生足够辉煌了。不错,那是从他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及其影响力来认识的。今年是父亲80周年诞辰,此刻,我不想谈这些影响力,只想还原一个真实的、没有任何光环的父亲。

父亲出生在1942年9月9日,他的童年和少年,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度过的。据父亲回忆,那时候他只是一个调皮而又好学的小孩,他的好学主要表现在学戏和练习书法方面。他上小学时的成绩好像很一般,后来,由于他的业余爱好——唱戏,使他在上中学的时候,变得有些与众不同。他参加学校的演出,也参加过社会公益性的演出——正定当时有名的

“二簧”活动。

步入青年的时候,“二簧”公益性演出也结束了。卸妆之后,他的脸上起了很多疙瘩,痒得难受。后来得知,那是涂在脸上的油彩和皮肤所起的反应。于是父亲便不再登台演出了。离开了舞台,但他实在不愿意离开戏曲。就这样他便开始研究剧本,研究唱词。大概是十六七岁,父亲为正定县剧团改写了连台戏《千里驹》。与此同时,他阅读了大量唐诗宋词和古典文学,大概是想将这些内容改写成剧本吧。那时候,作为剧团的一名专业编剧,有口饭吃就很不错了。

就像做梦一样,刚进入梦乡就醒了。1964年,父亲加入第一批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行列,来到距正定县城北十几公里的西慈亭村,做了半年社员。一次写黑板报的时候,村支书发现他有些文化,便让他到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员。此外,父亲还和本村热爱文艺的青年办起了俱乐部,到附近各

村演出,并参加县里演出。在他的感觉里,教学似乎比干农活更得心应手,做俱乐部工作似乎比教学更愉快。

参加完县里的演出,县文化馆发现了他的编剧才能。后来,县文化馆领导几经周折,将他调过去,做起了“副业工”。所谓“副业工”,就是每月的工资,需要往生产队缴相应的金额。在这期间,他在县文化馆创作了几个小戏。当时有些名气的是大型河北梆子《向阳花开》,由县剧团演出,获得了广大群众和上级领导的好评。上中学的时候,父亲就写些篇幅较短的小说,发表在当时的《建设日报》上。他在文化馆一边创作曲艺小节目,还一边悄悄地进行小说创作。后来他回忆说,创作曲艺小节目是正当工作,写小说算不务正业,虽然领导看不见,并不长久,但也很尴尬。那期间,他悄悄写出了《炉火》等几篇小说。

父亲在《河北文艺》发表短篇小说《取经》之后,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,写小说似乎成了他的正业。他加入了中

国作家协会,又到中央文学讲习所进修。此后,他接连创作了几篇小说,发表在《上海文艺》《奔流》《河北文艺》上。最近,为纪念父亲80周年诞辰,正定县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出资,将他上世纪70年代末创作的河北梆子独幕剧《半篮苹果》重新搬上舞台,由正定县河北梆子剧团演出。目前,该剧正在紧张排练阶段,很快就会与观众见面。

关于河北梆子独幕剧《半篮苹果》,当时是为正定县“三千会”写的,后来又参加地区汇演、省汇演,并且还得了奖,录了录像。那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,被录像的《半篮苹果》在那年春节期间的三番五次地播出,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后来,父亲当正定县文化局局长之后,县文化馆要参加省里汇演,馆长到家里找到父亲,反映了这个情况,他又根据自己前些年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年头岁尾》,改成了河北梆子独幕剧,经过一冬排练,年底参加省里汇演,又得了奖。《年头岁尾》在正定常山影剧院演出

时,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录制并播出。当时的河北日报、石家庄日报等媒体,对《年头岁尾》和之前的《半篮苹果》都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这似乎就是不加任何光环的我的父亲贾大山,看似他就是一位平常的民间艺人。直到1997年正月父亲去世,他这一生可以说是任一片孤寂中扬起了属于自己的风帆。他在孤寂中读书,在孤寂中创作。那年,我和一位外籍人士交流,他说贾先生绝对不是民间艺人那么简单,而是从民间艺人走来的著名小说家。也许是这样,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,父亲经常为我讲一些唐诗宋词,讲一些“聊斋”,讲鲁迅、孙犁以及他所喜欢的一些外国名著等。

后来,我在好多文章里注意到,人们说起父亲,都喜欢说“河北作家贾大山”或“作家贾大山”,是“作家”在先。可见,“作家”的称号早已打破了其他界限,因此其他的似乎就不太重要了,但也像满树的绿叶陪衬着。

谷阳的善意

□王厚明

英国作家托·布朗曾说:“真正的慈善能明察秋毫,哪里需要行善它一看就知道。”所谓善意,要恰到好处,而非一厢情愿。因为,善意是有时间和边界的,不合时宜或是偏离核心关注,哪怕是无心之失,都会背离初衷走向另一面。

据《韩非子·饰邪》记载:楚恭王同晋厉公在鄢陵交战,楚军战败失利,楚恭王还受了伤。战斗正打得激烈时,恰逢司马(即军事长官)子反口渴,要找水喝,他的亲信侍仆谷阳,捧了一卮酒给他。子反说:“拿走,这是酒。”侍仆谷阳反驳道:“这是酒。”子反把酒接过来一饮而尽,结果喝醉后睡着了。恭王想谋划战事,便派人去叫子反,子反说心口痛,推辞不去。恭王乘车前去看望,一进帐篷,就闻到烈酒的气味,便转身返回说:“在今天的战斗中,我的眼睛刚刚受伤,我所倚重的是司马子反,而他现在又醉成这个样子,这是不顾惜楚国的大好河山和臣民百姓啊,我不能同晋国再战了。”于是,恭王收兵离开鄢陵,并将司马子反处以极刑。韩非由此感慨道:“竖谷阳之进酒也,非以端恶子反也,实以心爱之,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。”意为,侍仆谷阳进酒,并非本来就很子反,而是真心地爱戴他,想不到,却因此要了子反的性命。

俗话说:人心向善。这本来是好事,伸出援手助人,更是善意最好的诠释。然而,谷阳好心的一杯酒,竟然浇灭了楚国的战机,跨越了“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”的边界。谷阳的善意,却要了子反的性命,堪称一桩历史悲剧。也足见,若善意用错了时机,颠倒个人与国家的轻重,则容易酿成一种不可弥补、难以挽救的伤害。

任何事物都有其适用的时度效,善意也需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勿自以为是地带来干扰和伤害。尽管善意有时会遭遇尴尬和风险,但善意本身并没有“原罪”,而是岁月无法磨灭的一种美,会使人的灵魂变得更加高尚,所以也不必因噎废食、心怀顾忌。

雨果先生曾说:“善良的心就是太阳。”显然,发自内心的善意,只要释之合时、施之有度,就会像太阳一样点燃希望、传递温暖、凝聚力量。

槐花飘如雨

□任崇喜

清晨健身,嗅到空气中充盈着淡淡的花香,令人心旷神怡。只见两排国槐,枝叶繁盛,树冠如盖,树下落英缤纷。远看,黄澄澄的,没有尽头,似雪非雪;近看,一朵朵一片片连绵不断,煞是好看。那场景,如轻雨过后纸洒出的碎金斑痕,有中国文人画的淡泊。

国槐,也称黑槐,是中国乡土树种,种植历史悠久。“汉家宫殿荫长槐,嫩色葱葱染绿埃”“青槐夹驰道,官馆何玲珑”……

北方古都,都少不了国槐。开封,曾为北宋国都,宋韵浓郁,国槐是市树,自然有不解之缘。当年,王祐为宋朝兵部侍郎,在自家庭院种了三棵槐树,将此庭院称为“三槐堂”,写下了姓氏家族繁衍的史话。

“槐色阴清昼,杨花惹暮春。”每当夏日,青槐叠翠,生机盎然,花满枝头,瑞雾香风。国槐苍劲盘虬的

枝干,蓬松如盖,古朴深厚;精致的羽状复叶,在阳光的晕染下,显出绿的不同层次,墨绿、嫩绿、翠绿与粉尘绿,有清凉的质感,不知为多少人遮天蔽日。司马光爱槐,在闲来幽居读书的小院里,也种上槐树,才有“榴花映叶未全开,槐影沉沉雨势来。小院地偏人不到,满庭鸟迹印苍苔”之感。

进入盛夏,簇簇白黄相嵌的槐米,层层叠叠,大大方方,在枝叶之上闪烁,随风跳动,味道不显。“嘉树吐翠叶,列在双阙涯。旖旎随风动,柔色纷陆离。”阳光渐浓,暑热加重,一嘟噜一嘟噜的花骨朵,尽情绽放,晕染着淡淡的浅绿,花香清淡,花形似蝶。只是,这样的光景,并不长久。微风拂过,花儿纷纷飘落,飘飘洒洒,宛如槐花雨,呈现出古城深巷的幽静,应了骆宾王的诗:“兰径薰幽珮,槐庭落暗金”。

清晨,也看到这样两排今年新植的国槐,树上花枝多而密,虽然花瓣小,一团团聚集起来,就有了别样的意蕴。树下落英缤纷,密密匝匝,细细碎碎,金灿灿的一片。一位年迈的女环卫工在用力打扫。槐花仍在不停地落,那个头发花白的女环卫工,头上、肩膀上、衣襟上,都有细碎的花粒。过不了一会儿,她就像在下雪天抖雪一样,把槐花粒抖落在地上。她扫过的地方,有斑驳光影似的花粒,地面又被铺成浅黄。

那位女环卫工说,槐花落得特别快,每天早上起来就铺了一层,就算刚刚清理完,一阵风吹来,满地都是。特别是雨后,若不及时打扫,极难清理,还会有碍观瞻。

“槐花落尽柳阴清,萧索凉天楚客情”“常恐郡城砧杵动,秋风吹尽古槐花”……古人看到槐花飘落的场景,多有凄然萧瑟之意。“黄昏独立倦



上离魂。狄仁杰再次被贬彭泽时,已成为御史大夫的霍献可,又再三再四坚请朝廷杀掉狄仁杰。后来,狄仁杰复相时,却举荐霍献可为御史中丞。

狄仁杰的大公无私与宽广胸怀,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与钦敬。可见,“公”字的魅力有多大。

此外,正者,必光明磊落,坦荡无私。

北宋宰相司马光,曾写巨幅榜文垂于客厅:“访及诸君,若睹朝政阙遗,庶民疾苦,欲进忠言者,请以奏牍闻于朝廷,光得与同僚商议,择可行者进呈,取旨行之。”若但以私书谏诤,终无所益。若光身有过失,欲赐规正,即以通封书函分付吏人,令传入,光得自省自责,佩服改行。至于整吏官职差遣、理雪罪名,凡于身计,并请一面进状,光得与朝中众官公议施行。若在私弟垂访,不请语及。”明示那些熙熙攘攘之辈,此处是个光明正大、磊落坦荡、不徇私情的地方。

“心正”抵万金

□马军

人有其宝。”

东汉东莱郡太守杨震,面对深夜送金的报恩人,斩钉截铁地说:“天知,地知,我知,你知,怎说无知?”

东汉寿春令时苗赴任时,乘坐的是一辆牛车。一年过后,母牛产下一犊。卸任后,时苗不顾群吏苦劝,百姓“攀轭叩轂”,坚决留犊而去。他说:“令来时本无此犊,犊为淮南所生有也。”

宋代,包拯晚年时特留遗嘱: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墓之中。不从我志,非吾子孙。”

上述四人之言,似乎并不高深莫测,字字闪烁着不灭的光辉,为无数后来者点亮一盏盏心灯,使之阔步迈向光明的坦途。《三国志·魏书》对时苗任寿春令时的政绩,总结为“令行风靡”“不肃而治”。

当然,正者,必公。公则太平,不公必争,这是一个万古不易之理。春秋时期,晋国的邢

侯和雍子因为土地纠纷,发生诉讼。负责审理此案的人叫叔鱼,才于出众,但德行有亏,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。叔鱼有意裁定“罪在雍子”,雍子得知消息后,就马上展开攻势,将其貌美之女嫁给叔鱼。叔鱼接受雍子贿赂后,便徇私枉法,改判那侯侯罪,那侯一怒之下,在朝堂上将叔鱼和雍子一并杀死。原本一桩普通的土地纠纷案,由于叔鱼肆意践踏律法的尊严和公正,导致三人皆输的悲剧。

唐代名相狄仁杰任大理寺丞时,一年内判决大量积压案件,涉及上万人,却无一入冤狱。为了国家选贤任能,他内举不避亲,其所荐之子狄光嗣,谦虚谨慎,亲民爱民,政绩卓著,口碑如潮,史称“刚正有祖风,事亲至孝,非常称职,循环省览,有足可矜”。

除了内举不避亲之外,他还外举不避仇。狄仁杰早年被贬官时,路经汴州,突然病倒。结果,时任开封县令的霍献可却不准他看病,勒令他马



明代海瑞,上任伊始,即断然革除贿赂京官的积弊,因为这些费用最后都要摊在老百姓头上。于是,便有好心人提醒他:“无此,则祸且立至。”海瑞却明确表示:“充军死罪,宁甘受,安可为此穿窬举劾耶。”

又有人对他耳语曰:“要做官不得不如是。”海瑞则回绝道:“尽天下而不为上官之赂也,岂足不迁?又天下而皆为上官之赂也,岂足不迁?安可自以其身甘沟壑也。”也就是说,假如所有地方官吏都不行贿,是不是就没有人调升京官了呢?假如所有地方官吏都行贿,是不是就没有一个人降职或获罪了呢?岂可将清白之身,置于肮脏的沟壑中啊。一席话,义正词严,将那些人说得哑口无言,讷讷而归。

恰如唐穆宗问柳公权用笔之法,柳答曰:“用笔在心,心正则笔正。”一个“正”字,蕴含了多少丰富的内容!

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以正率下,公平公正,风清气正,政通人和。欲安天下,必须先正其身,未有身正而影曲,上治而下乱者。欲正其身,必须先正其心,心正,方能身正。